

牛大勇 袁明 王立新 赵梅 李剑鸣 牛可 吴浩 杨钊 徐国琦

书写“共有的历史”

很少人注意到中美两国共有的历史——两国在文化层面和非政府层面的交往，两国在政治、军事、外交之外的“关系”。徐国琦循着入江昭教授“文化国际主义”的论述，复活这一段非同寻常却被人遗忘的旋律：蒲安臣、戈鲲化、古德诺、杜威、留美幼童和体育运动。



研究不同民族国家之间交流互动的国际史领域曾被“大国兴衰”的概念所涵盖，所用的语汇多是“国家利益”“国家安全”“力量均衡”，而这样的研究不可避免地倾向于以西方为中心，世界上其余的国家和地区则主要是作为大国力量延伸和控制的对象而进入人们的视野——被徐国琦称为“终生的导师”的哈佛大学历史系入江昭教授说。而国际史的研究方法能够揭示，国际关系在人们假定的国家之间存在分歧及潜在冲突的同时，还有着无限的跨越全球的交往。徐国琦正在致力的就是用这一方法重新梳理中美关系史，他想要向费正清“西方冲击—中国反应”和柯文“在中国发现历史”等模式挑战——“我有一个企图心，建立一个新的解释模式”。

2019年3月23日在北京大学历史系举办了“新全球化时代的中美关系史”座谈，探讨这一部“共有的历史”。《文匯學人》节录研讨内容在此刊布。

近年来从事中美关系史研究的人越来越少

牛大勇(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1979年《世界历史》第3期发表了一篇复旦大学汪熙先生的《略论中美关系史的几个问题》，文章认为不能把1784年以来的中美关系史一概说成是美国侵华史，这里有历史创痛，也有美好的记忆。《近代史研究》1979年第2期发表署名文章，认为美国对华的侵略性是毋庸置疑的。之后，北京大学的罗荣渠教授在《历史研究》1980年第3期发表《关于中美关系史和美国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指出中国方面的有关研究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掌握的资料不很丰富，范围比较狭窄，也缺乏系统性。一些问题需要重新研究，更广泛的问题则需要开始进行研

究。1844年《望厦条约》后美国追随英国对中国进行经济侵略，不平等条约毒化了中美关系。“门户开放”政策标志美国加强了对中国的经济、政治侵略和文化渗透，一直持续到1949年中国革命胜利。这期间交织着美日俄在远东争夺霸权的斗争，穿插了反法西斯战争中的中美两国结盟关系。1949年以后的中美关系也分阶段地显示出复杂性。总之，两国关系既不是一贯友好，也不是一贯敌对，必须对具体历史进行具体的分析。

到1984、1985年，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对中美关系史的研究也进入新阶段，人们的视野更宽阔了。1985年汪先生在复旦主持召开了首届中美关系史学术讨论会，把他的论战对手也请来参加，双方都表达了和解，也各自保留意见。更重要的是，这个研讨会请了一批正在崛起的新一代中美关系史研究者，后起之秀非常多。

这个会上讨论的话题已经很多样化，可以看出，中青年和老年学者群体间有个差别：中青年学者对“性质”这类的框架已经不太计较了。我就感慨，这些人后来去世的去世，去海外的去海外，留在国内的大部分人还在做，很多人做得也很有成就。去海外的人一半以上不再做中美关系史或美国史的研究了。但是，国琦兄一直坚持做下来，而且他的特点是厚积薄发，我再到他的时候，他正在哈佛大学埋头攻读博士。读完以后就任教，一直坚持在这个领域这么多年，

沿着老师入江昭开辟的路子做跨国史的研究。最近这十年来，新著叠出。他把中国放在不断国际化的进程当中研究，特别强调政府以外的国与国、民族与民族、群体之间的关系，绝不是仅仅盯着政府高层的外交互动。他关注民间层面的各种群体，包括非政府组织，有组织的、无组织的群体和个人，以及各种各样的交流：体育、文化、劳务，那是一个很广阔的天地。在各国互动的全球化时代，在中国不断融入国际社会的时代，到底有什么问题是值得研究并可以用新的视角来研究的，国琦兄的著作是一个启发人的典范。

我今天来座谈，看到袁明、国琦，有些感慨的是，群芳飘零，重聚在现在的就是我们三人。这种感慨之下，我作诗一首，请行家斧正：

如烟似梦隔世间，初识三十四年前。昂首一代生芳华，伏案千秋走笔椽。之江宏论风流去，燕京重逢几人还。不羡南柯不畏远，且循天道且随缘。

袁明(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当时在复旦开会的时候，我已经从伯克利大学进修回国了。我们从北京坐火车去上海，火车行进在华北大地上，我说起了在美国两年的感想，罗荣渠老师饶有兴味地听着，评论了一句：“从晚清派中国留学生留美，一代又一代，什么时候是个头啊？”在1980年代国家改革开放，一切呈现欣欣向荣气象的大环境中，罗老师讲出

这句话，充满着历史学者的当代好奇。罗老师的视野很大，他很快就启动了更大的研究，关于现代化的研究。他当时这个评点在南下的火车上发出，现在回忆起来还真有点文学感。

我想在此谈谈对“文化边缘人”的看法。国琦老师在书中着力讲述的，都是曾经在中美关系史中出现的跨越文化的人士，或者说是努力去进入与自己出生文化不一样的文化圈的人士。随着全球化的深入，跨文化会是一个趋势，所谓的“文化边缘人”也将越来越多。我在1991年曾经组织过一个国际会议“跨世纪的挑战：中国国际关系学科的发展”。我在自己的会议论文里就“文化边缘人”写过一段话：“所谓的‘边缘人’，从文义上讲就是文化传播者。在一百多年来将西方国际关系学说和研究介绍到中国来的过程中，几代知识分子进行了辛苦的耕耘。他们在当时的条件下是如何认识西方与西方国际关系研究的？他们具体做了哪些工作？他们在传播中得到过什么支持，又面对过什么压力？他们又经历过什么样的心路历程？几代传播者有什么样的共同点与不同点？在对西方学说传入中国这个问题进行思考时，很有意义的一项工作是探寻一下先驱者们的足迹。当然这并非易事。因为许多闪光的、对后人具有启迪作用的经历、思想、情感都并不见于公开出版物中，不少已经被历史尘封了。要做发掘工作，除去收集公开出版物外，还需看国内外人物档案、传记以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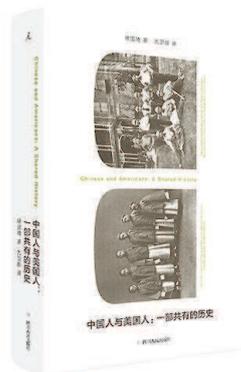
上述历史。在这一方面，中国学者的工作应该说才刚刚开始。”这段话是我差不多30年前写的，“什么时候是个头啊？”好像这个旋律又出来了。我们还要继续探讨，但是讨论要有基础，要做出像国琦老师那样的贡献之后，才会有讨论的基础，我们才能拿具体东西说话。

王立新(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学术研究是一个薪火相传的事业，需要一代代人延续下去，但近年来从事中美关系史研究的人越来越少，学者们都去关注当前的中美关系和国际政治，中美关系史领域远不像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和本世纪初那样热闹，这是不应该的，希望有更多年轻学者参与到中美关系史研究中来，把这项事业传承下去。

国琦教授的贡献不仅在于进一步运用档案丰富了过去的研究，更重要的是从“共有历史”的新视角，将这些人物的经历视为中美两国“共有的历史”和共同的过去，从而赋予这些人物和事件以新的意义。从全球化进程开启以来，特别是进入20世纪，国家与国家之间的交流和依赖越来越深，每个国家都不是封闭自足的，不同国家之间的历史有很多交叉和重叠的部分，这就是“共有的历史”。挖掘不同国家“共有的历史”和“共同的过去”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同时还可以促进国家间的合作，并有助于构建稳定、和平的国际关系。

大家都知道，当前中美关系处在一个十字路口，有人甚至认

(下转9版) ➔



徐国琦/著 尤卫群/译《中国人和美国人：一部共有的历史》(四川人民出版社,2019)